

论考据学的发展对书法的影响

张 援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在明代中后期,清之前,考据之学已经在慢慢地发展,而到了清代却不寻常的兴盛,其最重要原因在于清初的文字狱政策,对古文字的胡乱解释及书写,从而影响书坛的正常发展。误导后人的解读。

【关键词】考据学; 书法; 邓石如; 何绍基

1 考据学的发展

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发端于明末清初,盛行于乾隆、嘉庆年间,最终发展成以“乾嘉学派”最为著名。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文献加以整理、校勘等。谈及考据学,就必须先弄明白其产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影响。首先明确一点,考据学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抑或是一种学风。对于考据学,大多清儒认为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国学、历史、医学、艺术等。然而,在书法艺术的治学当中的运用亦是不可或缺,如书作时代、人物、款式辨识以及风格溯源考证。

清初考据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汉族文人士大夫不受重用,官场仕途渺茫。再加上异族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有所差别,思想难以走向完全统一,进而形成相应的矛盾。往往可能因为一言一行招来祸事。为了躲避这种祸事,避免迫害,许多学者开始慢慢转向考据研究。

2 考据学助力碑派书法

复古思潮的掀起离不开历史的政治背景:崇祯十七年,明朝覆灭,许多晚明遗民还处于思念前朝的悲痛之中,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时人总结其原因。在于当时学术风气存在的空谈心性的问题。因此,理学大家顾炎武高举学术务实的大旗,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考据为治学方法来扎实学术研究。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而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

清朝挥兵南下,统一全国之后,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文化领域,逐步限制汉族文人势力的壮大。大兴文字狱,随意曲解字义等方式,一度为时人所无奈,于是大多学者走上了单纯考据道路,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复古主义学风,力图经世致用。

随后学界的一心向古,不问世事,由此清廷逐渐放松,最后反而支持考据研究,极大地推动考据学的发展。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书法篆刻深入研究,纷纷提倡尚古,开始了书法艺术百花齐放的局面。清中晚期大量的魏碑墓志的出土,加大了对碑学书法的研究,慢慢形成学碑热风,再加上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最初的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后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再次主攻碑学发展。使晚晴书风焕然一新,书家百出,以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碑派书家为代表。这亦是得益于考据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3 书家代表之邓石如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此时崇尚碑学的书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成为碑学实践范例的是邓石如。邓石如,字顽伯,号完白山人,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碑以至汉碑等,表现其金石气以及雄浑朴拙的面貌,回归大汉气象以及魏晋风骨。碑学发展通过当时的一些书法践行者广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书出自己对于碑板风格的理解。如邓石如,世人对其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其书法以篆隶最为主动,篆书以“二李”为师,字势特点偏长,糅合隶书笔法,尤其晚年的篆书,线条迟涩厚重,饱满苍茫,古拙有劲,极具特色,开清人篆书新风,对

篆书的进一步发展功不可没。其隶书则胎息汉隶,勤于实践,用篆书笔法书写隶书,加强了书写流畅性。有别于传统经典隶书的范式,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为后世楷模。

4 书家代表之何绍基

考据学在整个清代成为一种显学,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经学、史学,甚至旁触大多文化领域。造成这种原因则源自时人所在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复古精神,很多文人学者纷纷投身于其中,力图振兴文化与艺术。而晚清的另一书家何绍基便是出类拔萃的代表。

何绍基,字子贞,湖南永州道县人士,生于清代嘉庆年间,正是文字狱最严重时期,但却也是考据学的发展时期,何子贞从小就受到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学习书画印,皆取法乎上,从唐楷上追秦汉,体现出其复古的“考据”精神。

诗歌之韵律与书同,而这些最根本的本源来自于深厚的传统知识功底,国学大师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卷十六有云:

“绍基于经学、小学,用力最深。是集卷四有《村谷论心图记》一篇而苗氏由精于文字音律,绍基亦邃于许书及金石刻辞。余早岁居长沙,获见其手批王筠《说文释例》稿本,深通字例之条者也。又尝得观其手批《十三经注疏》世徒重其书法,为有清第一。”^[1]

何绍基于诗词书画,经文的研究无不来自于其考据学的功夫。前人对何绍基的评价有很多,大多评其精通经学、小学及说文,但是在现实之中,世人多重视其书法,深究其书法如何如何,杨守敬有云:“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如天花乱坠,不可捉摸。篆书纯一神行,不以分布为工,隶书学张迁,几逾百遍。”

谭泽:“蝓叟致力于汉隶至勤,东京诸碑,临写殆遍,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者。”

二者多赞其书艺精湛,且甚是勤奋。至于何子贞的书法造诣以及其书艺的鉴赏能力皆与其深厚的“考据”精神分不开。何氏以颜体为宗上追秦汉,且持之以恒,根源于“考据”精神,追求真实的面貌往往就需要有这种学者精神。终其背后是因为考据学的复古风气让清代书法艺术再度的异常繁荣,从而开启了碑派书法的产生与复兴。^[2]

5 结语

由上可知,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对后来书法的发展影响重大。书法艺术的再一次大繁荣,主要在于考据学的复古思潮以及扎实而严谨治学方法为书法的发展于繁荣提供了很好借鉴,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进步,从整个民国时期到建国初期书法状况来看,仍然可以很直观地感受民国书法深受晚清书风以及学风之影响,如于右任,沈尹默,林散之,黄宾虹等对传统的书学研究用功很深,出新意而又不拘泥于古法。这种学术传统在现今的书法研究中一直沿用。

参考文献:

[1]张舜徽著,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3,第414页。

[2]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2015.02,第238页。

作者简介:张援(1990.07.22—)男,汉,湖南郴州人,硕士研究生,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书法篆刻。